
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編主五雲王

困貧與步進

(一)

譯弘樊 著治佐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進步與貧困

(一)

佐治治晏樊弘譯
陶孟和校

漢譯世界名著

譯者小言

自從近代的物質科學昌明，工商業日漸進步以來，凡在這些工商業最發達的都市裏面，無論在倫敦，在巴黎，在上海，在東京，我們都會看見着那在他們的土地之上所覆壓着的高聳雲天的危樓；在他們的街道上所飛奔疾馳的列車；在他們的商店裏所陳列的形形色色的鮮艷奪目的商品；和在他們的那些奢侈而浩費的大賭窩，大妓院，大旅館，大戲園，大跳舞廳裏面所去來的魔王也似的富翁，神仙也似的幼女，公侯也似的閥少。凡是這些繁華綺麗的現象，不問何時何地，均足令人驚訝着那近代的富之威力的偉大！可是在這些都市之中，我們亦會看見着那盈千累百的，赤足裸肘的幼孩，隨街要叫的乞丐，猙獰可畏的盜匪，和齷齪不堪的貧婦。因爲有此這些貧富懸殊，苦樂懸隔，地位懸異的種種矛盾的現象，所以舉凡略有感覺的人，無不向他們自己問道：『爲什麼在此財富日增之中有此貧乏，罪惡，愁慘的現象？』

爲什麼在此財富日增之中有此貧乏，罪惡，愁慘的現象？彌爾（John Stuart Mill）答覆這個

問題說，這是由於可以分配的財富太少，或工資基金太少；正如被除數太少，除數即令不多，商數亦自往下降低。記得吾國馬寅初先生，當他努力去解答中國的利息何以如是之高，工資何以如是之低的時候，也曾指出這是由於資本缺乏之故。可是這種答覆，佐治（Henry George）卻否認其存在：因他所根據的理由是，英國的可以分配的財富，在十九世紀的時候，比較美國更多，但美國的工資卻比英國為高。又馬爾薩斯（Malthus）答覆這個問題說，貧乏，罪惡，愁慘的現象之所以發生，乃是由於人口增加太快，食物增加太慢之故。返觀中國的那些力持節制生育的人，理由與此略同。可是佐治則斥駁這種理由為荒謬絕倫；因他看見當時的人口最多之英倫，常比人口次多之紐約為富；反之，人口尙少之美洲，復比人口已多之美洲為貧。馬克思答覆這個問題說，這是由於資本掠奪工資，所以資本應該沒收。現在中國共產黨之理論，也是主張這話不錯。可是佐治則力駁此言為謬偽：依據他的意見，資本只是過去的勞働，因此利息遂成勞働的工資；倘如我們堅持利息掠奪工資，直不啻是說工資掠奪工資，這話豈不有點欠通？然則上面所提出的這種貧乏，罪惡，愁慘之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呢？佐治亨利毅然決然答覆這個問題說，這是由於那種個人沒有絲毫的勤勞，坐享

衆人改良的結果的地主階級所造成的，亦即地租制度所造成的。遠點的事且不說，但看中國黃浦灘的地面，現在每畝價值銀洋數十萬，試問握此土地之所有主，他們在此土地之上的勞力何在？可是，他們卻要坐享地價之全部。又他們雖然不用勞力，但在他們的午餐掉上所吃的澳洲的羊、青島的牛、長江的魚、美洲的橘，與同上海各地的豬肉，野禽，青菜，牛油，卻無一不是其他的人勞動的結果。我們只要閉着眼睛一想，便知他們是如何的榨取我們，我們應如何的去不許他們榨取了？

中山先生說：『中國的土地問題來了。』試問中國的土地問題是怎麼來的呢？來了以後又當如何去解決呢？我以為凡被地主剝削的勞動階級，和被人稱為剝削勞動者的地主階級，都應該一讀本書。

依據進化公律所詔示，人類社會之制度漸由名分制度，進而至於契約自由制度，現在又由自由契約制度再進而為國家干涉的制度了。若問國家因何要去干涉社會的制度，究其旨趣所在，要不外要想實現利益之公平分配。現在的中國國民黨主張平均地權，實以實現公正之利益分配為理由。佐治的進步與貧困一書，確是毫無疑義的主張平均地權的一本絕好的書，他比較孫中山先

生所主張的平均地權還要激烈許多。我以為凡相信平均地權的人實應該用種種的方法，將他努力宣傳到民間去。如果此書出版之後，全國的地主階級，因為熟讀此書之故，自知土地的絕對所有權，毫無存在之理由，深深服膺於國民黨之平均地權的政策，而使全中國之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度而展進，這豈僅是中國人民之利！

此書承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之介紹與勉助，使得迅速翻譯出版，實深銘感。又此書譯成之後，至承好友何君靜源、施君澤民、刁君培然、羅君志儒、楊君飭吾、蔣君再可、李君進之、歐陽君執無，分爲校閱，予以指示，無任欣謝。本稿最後復承北大教授陶孟和先生和好友曾仲剛君綜合全部譯稿，重行校閱一遍，並承改正，尤深感謝。

民國十九年五月，樊弘序於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。

佐治亨利(Henry George)的傳略

佐治亨利（一八三九——一八九七）是美國的一位經濟學者。他於一八三九年九月一日生於美國賓州(Pennsylvania)菲列得爾菲亞(Philadelphia)城內。家貧，十四歲時，即無力再住學校，不得不向社會尋謀職業以圖自給。初被僱充商船茶房，航行於澳洲新金山(Melbourne)及印度加爾各答(Calcutta)等城市。次為印刷業者，一八五八年移住於美國西岸之加州(California)舊金山(San Francisco)，從事印刷業。再次為報館通信員及編輯，一八六五年開始向舊金山時報(Times)通信，竭力勸導工人注意其本身之政治和社會的狀態。旋以論著之力陞入幹部。一八六六年向紐約民報(New York Tribune)投稿，攻擊中央太平洋鐵道會社的獨占的橫暴。一八六九年再向該報投稿，討論支那人問題，該項論文，聞頗得英國經濟學者彌爾(John Stuart Mill)的贊許。最後則傾注全力於經濟社會等問題的研究，對於土地問題尤感興味。一八七一年刊行我們的土地和土地政策(Our Land and Land Policy)一書，討論土地問題。一八七九年

更將該書簡鍊洗刷，題爲進步與貧困(Progress and Poverty)出版。此書論旨的大要，在說明土地的價格在大體上，實始基於一種獨占的性質，而非根本於土地所有者的勞力；因此之故，凡租稅的負擔應悉取償於土地，以圖減盡獨占的利益，並實現經濟上之機會均等主義。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之孫文學說中，亦曾褒獎此書，他說：『近世歐美各國之工業革命，物質發達，突如其来，生活程度，遂由安適地位而驟至繁華地位，社會之受其影響者，誠有如佐治亨利之進步與貧困所云；』又孫氏所著之三民主義，關於徵收土地稅之理論與實行，於是書亦多所取材。

進步與貧困在佐治著作中，首推名著。該書初發刊時，尚不爲美人所甚注目；但因本書見理甚深，不久遂博得歐美各國讀者的讚賞。旋被譯成歐洲各重要國家語言。德國並有譯本三種。一八八〇年佐治再由加州舊金山移居紐約，嗣後聲名漸甚。一八八三年頃，資望極高，至被目爲宣傳新社會教義的使徒。曾漫遊美國並英國諸地方，演講土地問題及其他政治經濟諸問題，並繼續不斷向報章雜誌發佈意見。畢生生活，極爲忙碌。佐治未嘗懷有政治野心，但因衆望所歸，一八八六年竟被舉爲紐約市長的中立候補人。時以共和民主兩大政黨聯合抵制，結果佐治共得票六萬八千，共和

民主兩黨的聯選候補人得票九萬，終於失敗。一八九七年，佐治再被選為紐約市長的候補者；但不幸忽於選舉期中，辭世以歿。紐約公民多為慟哭。葬儀之盛，在美國歷史中，無一市民之死，能有與之相頽頏者。吾人綜覽佐治生平，覺其學問道德均堪師表。

佐治根本思想是主張人人皆有平等的使用土地之權。此種見解，並非創始於他；但以最簡單的方法實行此種平等權利，則為佐治所獨見。這個新的實行方法稱做『單一稅』。佐治的信徒，為了實行單一稅，曾於大不列顛、北美、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處喚起民衆運動。目今此種運動雖未實現，但其所及於土地重稅之影響，殊非淺鮮。茲將佐治重要著作，選錄於後，以備參考：Progress and Poverty (1879)，The Irish Land Question (1881)，Social Problems (1884)，Protection or Free Trade (1886)，The Condition of Labor (1891)，A Perplexed Philosopher (1892)，Political Economy (1898)。佐治的兒子亦名佐治亨利，一八六一年生，曾為渠父立傳，該書於一九〇〇年刊行，題為 A Life of Henry George。關於單一稅的學理，請看 Shearmain's Natural Taxation (1899)，便可知其大凡矣。

樊弘撰。一九二八年，一七社會科學研究所。

獻給這些

因看見財富的不平分配和特權
所造成的罪惡和愁苦

感到高尚的社會狀態的可能
並願努力去實現他的人們

舊金山，三月，一八七九年。

進步與貧困第一二十五週年紀念版本的序文

有一位年紀不到三十歲大的少年，從我們的曠闊的西部，來到紐約這個大城內。他的身材短而且瘦。他的學校只是印刷店和海船艙下的水手棲息之地。他沒有資產，沒有攀附，沒有聲望。他從一座靠在我國黃金門戶上的小城，來此設立一所電報新聞社，專替彼間一張正在奮鬥掙扎中的小小報紙報告消息，不顧那些併有大印刷機和電報機的獨占會社的排斥。這個奮鬥，強弱大小，太不相等。因此之故，這位少年竟被那些獨占會社打的弱弱而敗，結果他的小小報紙竟倒臺了。

這位少年就是佐治亨利，正是一八六九年時候。

佐治雖然被打敗了，但不是被征服了。在這一次奮鬥之中，會長出了一件日增月進的東西，一直到他填滿民衆的胸腔，並變成一列『旌旗蔽天轟轟烈烈的大軍』。

這位少年通信員，每當他的報紙奮鬥終了之餘，散步街衢，默默不言。當在散步的時候，他看見了這些富之威力的表現，不覺充滿驚奇和駭異。這裏所見的私人的財富，煞是別處所曾夢想不到，

真比得上寓言裏面的曼特克利斯托(Monte Cristo)的發財了。但是，此處亦還是有貧窮和卑賤，不足和恥辱，與這富埒王侯的宮殿並立對峙，使的這位西方新到的少年心中耿耿不快。

為什麼在恁的一塊豐裕的土地上，在此恁的一塊——如果把他上面所有的資財公平的分配起來，不但可以滿足我們全體的需要；並且尚還有剩餘的土地上，應該有這一些不平等的境地呢？為什麼這種高積如山的財富須與那貧深似海的窮困連在一處呢？這裏可算最富足了，為什麼強壯的人應該尋求不得職業？為什麼婦人應該面黃饑餓，小小的孩兒應該消磨他們的青春在這苦苦操作的腳踏紡織機裏面？

這是自然運命中所必須經過的事情嗎？不，他是不能相信他的。就是在這個城市的街道上，並在一個白天，他的心裏忽然來了一種熱烈的思潮，一種天心的召喚，一種神明的啓示。他的神經通戰抖了。他向他自己宣誓道，他今後將要永久的不休息了，直到他已經如果能彀找着了這個貧富懸隔的原因，和救濟他的藥劑。

當他的電報新聞事業失敗之後，他立刻的回到舊金山去了。他的心中沒有一時不想着他的

誓言。他看見了這種土地投機的買賣，封鎖了廣大的疆土，以致土地不能讓勞動使用。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看見着一種『買占』土地的努力；一種只圖獲得，只圖把持，但候價漲，不許使用他的努力。因為土地被買占了，結果可耕種的土地太少，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，他都看見着那些想耕種土地的人，彼此相互競爭土地。他預料將來人口越多，競爭一定越發厲害。結果這些保有土地的獨占權利的人，一定變爲將那些必須使用土地的農民作爲自己的私產的人。

充滿了這種思想的佐治亨利開始在一八七一年坐下，他總共費了四月的工夫，寫成一本小書，名叫『我們的土地和土地政策』。在那本一共四十八頁的小書裏面，他主張廢除所有一切的勞動稅和勞動產品稅，單獨徵收一種土地上的不勞增殖的價值稅，以圖減盡土地的獨占利益。這本小書刷印至千，但是這位著者不久又有了一種新的見地了，這就是說，這一本書如果真要能彀喚起讀者的注意，還須得要更加完備。

大約過了六年光景，這本更完備的著作出來了一。一八七七年八月進步與貧困開始起稿。他是那顆橡子——我們的土地和土地政策——所長出來的一顆橡樹。這本較大的書『專研究工業

的恐慌和不足，伴着財富增加的關係，」並指出一種救濟他的法子。

苦苦的著了一年又七個月，並備受種種的艱難困窘，非但他家中的應接室裏不用地氈，甚至常常的被逼迫着去典當他個人的物品，方纔把這一本書全做完了。

當着他把本書的最後一頁寫完的時候，業已是那日的深更夜靜的時候。是時，佐治亨利獨一個人，兀自跪在他的膝上，啜泣的，如像小孩一樣的，哭了一陣。他已經完結了他的誓願了。但以後這書的命運，則完全是在上帝的手內。

接着這份抄本便被送到紐約，去尋求一個出版者。但在那個地方的出版家，有的說他是紙上空談，有的說他希圖革命，大多數都說他的主張不安全，所有的人都說他不能行銷，或僅僅的殼敷出版費。大凡政治經濟的著作即令出自名家的手筆，亦且顯然不是賺錢之物，何況這一本書又是一個倒霉的人所作，此人既沒名氣，更沒聲望，則又還有什麼賺錢的希望呢？但幸末了，亞蒲列同公司（D. Appleton and Co.）答應把他出版；但要著者負擔大部製版費，此外亦別無什麼希望了。因此之故，佐利亨利爲便於他自己的監督製版起見，當在舊金山的一所朋友所開的印刷所裏面，

將活字版排好，這書的著者並親自排列最初的兩盤活字呢。

當着此種活字版尙未運往東部的時候，他們先行在此間付印，於是而『著者所親自校閱的版本』便有五百出版。在這五百本書之中，佐治亨利檢了一本，寄往菲列得爾菲亞（Philadelphia）獻給他的可尊敬的八十一歲的父親。同時這個兒子寫道：

我一面感謝我們那天上的父親，一面把我的一本印刷成功的書送呈你老人家。多謝上帝的保佑，我把這書直寫完了尙還沒死，並且你老人家也還能殼看他。他代表很大的工作，又代表很大的犧牲，但是現在業已竣事。最初，也許最初的一段時候，這一本書定將不為讀者所重視；但是，最後，一定要被認為一部傑作，並要在東西兩半球上連連出版，並要被譯成各國的文字。這點我知道，雖然我們不必能在此處看見。但是我在此書中所表白的那種信心，即我們尙還有第二個生命，不問看見或不看見，都不重要。

這一本書必被認為一本傑作的預言，不久便實現了。回顧紐約亞蒲列同公司（D. Appleton and Co.）於一八八〇年正月，印行本書的第一次的通常流行於市面的版本之時，距今恰纔二十

五年。是時紐約舊金山的某報紙尙且嘈笑此書爲『小小佐治亨利的小小癖物』，並且斷定這本著作一定沒有什麼人讀。但是在本國的其他地方和外國的報紙上，如倫敦泰晤士報（*Thunderer*）和有名的大期刊愛丁堡評判（*Edinburgh Review*），均稱此書是一本令人豔羨的著作，不能輕輕的被人埋沒。在美國和英格蘭兩個國家裏面，他都被擺在那些廉價書報裏面，如同推銷最有名的時髦小說的辦法一樣出售。他又在兩國的新聞紙上連期披露。又被譯爲歐洲各種重要的語言。德文譯本共有三種。此書出版的冊數恐尚無確切的報告，但據一種穩健的估計，進步與貧困，包含着各種版本和各種譯本在內，業已出版了兩百萬冊以上了；又我們，如果將佐治亨利後來所寫的關於同一題目的書籍，假令他叫進步與貧困的文庫一併計算，或許已經有了五百萬本流行於世界了。即此可見此書對於世界的貢獻啊。

紐約，小佐治亨利。一九〇五年，一月二十四日。